

变迁中的思想与时代: 第九届历史学 前沿论坛会议综述

万振凡, 彭庆鸿

(江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22)

摘要: 2015 年 11 月 13 日至 15 日, 第九届历史学前沿论坛在江西师范大学瑶湖校区召开。本届论坛以“思想与时代”为主题, 共有 20 多家高校和科研机构的 60 余位专家学者参加, 提交论文 53 篇。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 学者们就“思想观念形成与演变”、“历史记忆建构与文化变迁”、“国家制度与地方社会”、“历史学的学科建设”等相关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关键词: 第九届历史学前沿论坛; 思想与时代; 会议综述

中图分类号: K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79(2016)02-0185-06

Ideology and Times in the Changes: the Ninth Forum Summary of the Historical Frontiers

WAN Zhenfan, PENG Qinghong

(School of History Culture and Tourism,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330022, China)

Abstract: From 2015 November 13th to 15th, the Ninth Forum Summary of the Historical Frontiers WAS held in Yaohu,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The theme of the forum is “thought and times” and there are more than 60 experts and scholars from over 20 universities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ions. 53 papers were presented. During the two-day meeting, scholars have carried out a thorough discussion on the related issues such as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ideas, the construction of historical memory and cultural changes, the national system and local society, the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of history etc. And fruitful results have been achieved.

Key words: the Ninth Forum of Historical Frontiers; thought and times; forum summary

2015 年 11 月 13 日至 15 日, 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历史研究》编辑部、江西师范大学中国社会转型研究省级协同创新中心、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共同举办的第九届历史学前沿论坛, 在江西师范大学瑶湖校区国际交流中心隆重举行。本届论坛以“思想与时代”为主题, 共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大学、吉林大学、华中师大、首都师大、上海师大、江西师大以及澳门大学等 20 多家高校和科研机构的 60 余位专家学者参加, 提交学术论文 53 篇。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 60 余位学者分为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三个会场, 围绕“思想与时代”主题, 就

收稿日期: 2015-11-28

作者简介: 万振凡(1962-), 男, 江西余干人, 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

彭庆鸿(1990-), 男, 江西井冈山市人, 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

“思想观念形成与演变”、“历史记忆建构与文化变迁”、“国家制度与地方社会”、“历史学的学科建设”等相关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

一、思想观念形成与演变

思想是时代的产物,是时代精神的体现。不同时代形成不同思想,时代的发展助推思想的革新与演变。在中国古代思想方面,学者对秦汉之际的《公羊》与《谷梁》学说及政治思想进行了探讨。王刚《〈公羊〉“大一统”经义的成立与秦汉之际的政治思潮》从《公羊》“大一统”概念确定的时间出发,指出秦汉之际的政治文化是由秦时期的法家政治“大一统”,演变为汉时期的文化及心理“大一统”,从而推断出《公羊》“大一统”经义的产生是在秦灭之后。《公羊》与汉王朝在“拨乱反正”上逐渐合流,使得汉王朝在“大一统”的建构与实现中,日渐走上了伦理共同体的道路。秦汉间的政治实践与政治理论出现了从“法令”到“天令”的嬗变。李禹阶《谷梁学说与西汉中后期国家治理思想的演变》提出,汉武帝之后社会矛盾尖锐,《春秋公羊》逐渐满足不了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春秋谷梁》学说恢复宗法礼制的主张和“述旧礼,明王制”的理论特点却适应了西汉中后期社会发展的需要,逐渐被统治者所重视,最终成为与《春秋公羊》并立的学说。西汉中后期的国家治理思想,从单一的依靠“公羊学说”逐渐演变到“公羊学说”与“谷梁学说”并行。王刚与李禹阶一个探讨《公羊》“大一统”经义成立与秦汉的政治思潮嬗变,一个探讨“谷梁学说”与西汉后期国家治理思想演变,一前一后,一“公”一“谷”,相得益彰。杨新新《从“方外之地”到“列为诸侯”——汉初士人的“南越国”认知》探讨了汉初士人对“南越之地”认知的变化。汉之前,由于文献的缺失,中原人士对国境之南的赵越政权认识有限,从而将南越之地想象为偏居滨海的蛮荒之地。汉武帝统一南越后,“南越国”的形象认识产生,由“方外之地”转变为中央“大一统”之下的“诸侯国”,揭示了汉初士人认知观念的变化,而这种变化的基础则是建立在“大一统”的事实与叙述语境之下完成的。代国玺《“赤九”讖与两汉政治》认为,在汉哀帝至东汉章帝的百年时间里,“赤九”讖的诸多内容都获得了落实。哀帝时期的政治路线斗争,莽汉之际的政权变更,东汉前期的政治目标和政治制度,皆受其推动,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力。薛海波《陈寅恪“关陇理论”六官观点再探》一文以武川镇豪帅在西魏北周中央官僚体系地位变化为研究案例,认为宇文泰行周礼六官目的不是为了与高欢、萧梁对抗,而是出于排挤魏室、架空魏帝的政治考虑。其结果也导致了北周与宇文护等人权力的冲突,其他关陇各群也因此惨遭打击和杀戮。该文对陈寅恪关于宇文泰行周礼六官可以维系关陇胡汉诸族之人心的观点进行了探讨。江湄《从辽、金行记看宋代士人的“华夷之辨”》考察了宋朝汉族士人对异质文化、对“华夏”与“夷狄”的切身感受与认识。两宋之际,一个包容广大、多种意志并存的“大中国”意识出现在北朝,并对宋朝“中国”意识形成了威胁和挑战。此外,李玉君与赵明对儒家思想进行了研究。李玉君《儒学与历史上北方民族政权的治国理念》重点分析了中国传统的儒学思想被北方少数民族吸收后,成为北方民族政权的治国的正统思想。为更好贯彻儒学的治国思想,北方民族政权大量任用并培养儒家知识分子,最终将儒家思想贯彻到了治国理念中。儒家思想的治国理念也对北方民族政权的社会稳定和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赵明《儒家思想教育观的历史反思》则指出儒家教育思想的核心是“育人为本”的素质教育观,对古代教育思想有突出贡献。但这种教育观不可能超脱历史的局限,也存在着内在的矛盾性,并且在传统社会中儒学思想与实践经常相悖离。当今大学素质教育应对儒家素质教育观进行批判的继承与发扬。

在近代思想方面,引人关注的是学者对新文化运动思潮的深入阐发。张艳国《论辛亥革命后尊孔思潮与新文化运动的激荡共生》认为,民初尊孔思潮与新文化运动是一种“种瓜得豆”,其文化形态和性质是激荡共生。这时期中国文化处于古今、新旧、中西交汇的节点,既相互冲突又相互融合,是文化的革故鼎新、新陈代谢和新生新进,从而掀起了澎湃的文化激流。这种激荡共生促进了对孔子学说的批判和继承,促进了新文化的转变。陈廷湘《新文化运动何以为“新”的思想文化运动》认为,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历代思想争鸣的最高峰,是科学世界观的创造性应用,是人的解放与新道德的统一,是人类解放、民族

解放与个性解放的统一,是中国思想史上最重要的一座里程碑。此外,戴建兵《张謇的货币金融思想与实践》中对著名实业家张謇的金融思想进行了研究。在货币方面,张謇积极参与《国币条例》与《国币条例实施细则》的制定,认为中国实现不了金本位制,应实行银本位制;在企业、银行融资思想上,张謇提倡创办银行,主张各级政府注入资金方式参与民营银行,积极设立合资和合作银行,并关注银行资金向实业运动转投;在金融市场方面,创建金融市场,推动《证券交易法》等法律的制定和颁布,强调发行国债积累资金以支持实业。王先明《集体化时代“新农村建设”思想的孕育与形成》指出,刘少奇是中央领导层中最早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概念并加以思想阐述的领导人。他强调“新农村”之新的内涵在于制度之新、时代之新。集体化的“大农业”是新农村建设的方向,新农村建设不仅是农村建设,还要进行“新农民”的培养和改造。

二、历史记忆建构与文化变迁

历史记忆与文化是本次论坛主题“思想与时代”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众多学者关注的问题。其中,关于历史记忆建构的研究,成祖明《封建、郡县之变中的儒学建构》将哈布瓦赫“集体记忆”、“历史记忆”的概念运用到古典经学思想领域。作者通过对比春秋以降封建、郡县社会结构变迁运动中的儒学的创生与不同历史记忆的建构,以及今古文本在历史记忆的断裂与成长中的延续与重构的考察,对中国学术史上存在已久的今古文之争提出了另一套科学的解释体系。王大文《被“遗忘”的历史——康熙朝纂修〈大清一统志〉与江南文人》论述了康熙朝以徐乾学为代表的江南文人在初修《大清一统志》过程中的表现、影响以及被“遗忘”的历史命运,借以探讨清初的文化政治,进而分析了清初政治中满汉因素的微妙关系与正统性的复杂面向问题。庄泽晞《中国人初识卢梭学说时的历史情境——晚清首届驻日使臣与自由民权运动》探讨了以黄遵宪为代表的首届驻日使臣在日本初识卢梭的历史情景。黄遵宪等在驻日期间,恰逢日本自由民权运动兴起,从而接触到了卢梭学说,并对其产生抵触,对君臣纲纪进行了维护。此外,作者还从知识摄取的角度,分析了中国人接触到卢梭学说的可能途径。蒋积伟《1940年代新民主主义优势话语权的建构》梳理了新民主主义话语权由产生到确立的过程,揭示出中共在新民主主义话语权的建构中的几大基本脉络:在建构路径上,由内向外;态度上,由被动向主动转变;在传播内容上,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在建构形态上,存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特点。

在文化变迁研究上,霍巍《试论吐蕃思想文化的“底色”》通过敦煌古藏文文献资料,通过对吐蕃佛教思想中的汉地影响及汉地阴阳五行、八卦、风水堪舆等传统文化对吐蕃的影响的分析,认为吐蕃王朝时期在哲学、宗教与思想观念等各个方面都深受到汉地文化的影响。在其文化“底色”与根基当中融入了“汉地文化圈”的若干因素,映射了吐蕃文化在深层脉理上与汉地文化之间的趋同性、相融性和同质性。这是吐蕃与其他国家、地区文化交流往来所体现出的本质之处。李平亮《文化的建构与社会实践——宋明以来许真君信仰的发展与演变》研究得出,许真君信仰的发展经历了由“净明祖师”到“祀典之神”,再到“江西福主”的文化变迁。许真君多元文化的塑造,有着不同的社会文化内涵,反映了地方教派、国家祀典、士人阶层、商人群体、家族组织与地方社会文化创造的互动历史过程。王剑《有明之无善政自内阁始——论明初政治变动中的内阁政治文化》认为明初政治内阁的产生,是遵循着既要维护皇权的高度集权,又要解决中枢决策低效的原则。但是内阁的发展,却没有使内阁体制固定下来,相反还使得明代中后期皇权的肆意和宦官政治的异化,从而得出明之无善政是从内阁开始。刘勇《明代中后期的〈大学〉文本改订竞争运动》探讨了明代后期许多理学学者效法朱熹、王阳明,对《大学》文本进行改定,进行理学学说的创新活动。这次改定活动产生了朱熹、王阳明之间调和的《大学》文本,也出现了海外引进本、先秦古文本等多种文本,形成了百余年《大学》文本改定竞争运动。王悦之《清末舆论政治的崛起、影响及属性初探》探讨了清末的“舆论政治”。作者认为,近代以来由于交通通讯的改善、印刷术的进步、报刊的兴起、西学东渐和政治化等思潮的汇集,使得“舆论政治”在清末成为一个极具势能的权力磁场。“舆论政治”崛起深刻影响了清末的政治局势,经过苏报刊、立宪运动对君权的挑战、驯化

后,最终在辛亥革命中颠覆了清政权。这为晚清政局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王晓德、郭子林、杨巨平、朱君杙、张勇安等对世界文化进行了探讨。王晓德《从文化视角对研究欧洲反美主义的思考》一文从两种文化对立的角度分析了欧洲的反美主义。作者认为,由于根深蒂固的历史因素,加之“现代性”美国文化的传播对欧洲高雅文化和传统方式的威胁,使得欧洲上层精英对美国文化表现出不屑,必欲抵制而后快。欧洲上层精英对美国文化的贬低和抵制逐渐演绎成为不同形式的反美主义。郭子林《传统文化观念的变迁与古埃及文明的消亡》则从传统文化观念变迁的视角去解释古埃及文明消亡这一命题。作者认为,古埃及文明的消亡,主要表现为文化观念的改变。古埃及人形成了特殊的文化观念,这种文化观念的核心是以特殊文字为载体、多神崇拜为背景的神圣王权观念。随着与外来文化的不断接触,古埃及人的文化观念发生变迁,传统的文化观念被放弃,逐渐接受了罗马帝国的基督教信仰。古埃及传统文化观念的终极,而古埃及文明也在这种意义上消亡。杨巨平《远东希腊化文明的历史定位》认为,在“希腊化远东”地区即伊朗高原、两河流域地区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希腊文明子区域,使得希腊化文明在这一地区得到延续。在此基础上,此地的希腊人又不断调适自我,有条件地结束当地文化,从而创造了独特的“远东希腊化文明圈”。朱君杙《论查理曼加冕对拜占庭皇帝世界宗主权的冲击》通过对中世纪拜占庭皇帝世界主权历史的长时段追踪,认为800年的查理曼加冕实现了古罗马帝国与西方蛮族王权的有机结合,推动了西方文明的形成。此外,查理曼加冕使得拜占庭帝国的世界主权发生了由“名实俱符”到“名实不符”的转变,彻底摧毁了“一个罗马皇帝、一个罗马帝国”的古典政治空间,使得地中海东部与西部之间的分离加大,最终形成了拜占庭文明和西方文明这两大不同地域形态的文明。张勇安《作为冷战武器的毒品:安斯林格的想象与美国对华外交(1950-1962)》叙述了美国为了抵制中国对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美国联邦调查局专员安斯林格抛出了一个“中国种植、生产鸦片”的荒谬想象,引起了东西两大阵营的争论,使得冷战升级和扩大化。作者对“安斯林格的想象”进行了微观个案研究,重新审视了中美关系,考察了毒品何以成为冷战武器。

三、国家制度与地方社会

国家制度是国家意识的体现,地方社会的治理是国家意识的实践。国家制度与地方社会形态是思想与时代的产物。与会论文中,陈絮《商周时期的东土开发与象之南迁而不复》探讨了周人东征后,大量农耕的西土外来人口进入到泰山周围尤其是汶水流域地区,将田猎区改造为农耕区,对当地的自然环境造成破坏,导致野象的南迁。随后,由于气候的变化,环境的进一步破坏等情况,导致大象一去而不返。刘再聪《村坞相属:魏晋十六国河西走廊“村”聚落的自然形态》以嘉峪关酒泉魏晋墓中的“坞”砖画为中心,结合文献资料和出土文书对河西走廊的“村”聚落形态的特征做了探讨。他认为,河西走廊地区首次使用“坞”这一名称;村坞相属是河西走廊聚落形态的时代特征。“坞”这一基层组织在隋唐时期并没有消失,只是名词转变为“堡”、“砦”。韩涛《唐代进士的时空分布研究》对唐代进士的时空分布进行了细致的统计、归纳与分析。时间上分为三个阶段,唐高祖太宗为恢复期,高宗和玄宗为发展期,肃宗至哀帝朝为持续稳定期;空间上,北方多于南方,东部多于西部,较为集中在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及华北平原、关东平原以及长江下游的吴越地区,呈现出“一条线与一大片”分布态势。刘晓《元朝江西行省镇戍军万户府考》对元代江西行省的历史沿革、辖区等史实进行了考证,并对江西行省的万户府地理分布进行了分析。郭培贵《明代进士家族相关问题考论》对进士家族的数量、进士家族的进士比等进行了详细的统计,得出明代进士家族的进士比例低,从而反映出明代科举制度维持着很高的社会流动性。明代进士家族几乎不超过三代,从而推断出进士家族的社会与政治影响力大致维持在三四十年至二百年左右。薛理禹《明代保甲法的成效与弊端探析》认为,明代保甲法在打击盗匪、维护治安以及防灾救灾方面具有一定功效。不过保甲法由于在立法、执法和守法环节存在较多弊端,导致效果有名无实,甚至成为扰民恶法。王洪兵《敬天勤民:耕藉制度与十八世纪清代皇帝的农耕仪式》研究指出,传统的耕藉制度在清代被纳入到国家祭祀体系,清廷为了国家治理的需要形成了时代特色的农耕仪式。耕藉制度及农耕

仪式突出了清代“敬天勤民”的治国理念,有利于引导民众重农务本,同时也有利于神话皇权,整合政治资源,建构统治合法性,达到维护统治秩序的目的。梁仁志《“弃儒就贾”本义考》对部分学者提出的“弃儒就贾”观点提出了质疑。他经过考证后认为,“儒”是指科举士子不是“士”,“弃儒者”不一定是儒生、士人,且“弃儒”也不必“就贾”。这一考证对明清商人地位和士商关系这一命题有了重新思考。

马俊亚《万流归宗: 江苏近代社会形态的地区性考察》认为,在近代江苏同时存在三种社会形态: 苏南地区社会形态是半封建半资本主义,淮北是半领主制半地主制,两淮是半封建半奴隶制。唐力行《夕阳西下几时回: 传统苏州评弹的当代命运(提纲)》考察了苏州评弹产生、成熟、变异、衰落的过程。由于苏州评弹在内容上经历了随意评弹向嚼本子的变化,难以保存,且还有学徒培养问题。如今苏州评弹虽成为文化遗产,但难以挽救。胡勇军《井水还是河水: 民国时期杭州城市饮用水源及其差异性》认为,民国时期杭州的饮水结构依然保持着井水、河水与西湖水并存的局面,并且两种水源还存在城乡之间、城市内部之间的差异性。杭州的饮水也经历了河水到井水再到自来水的变化。易凤林《阶层的差异性与一致性: 国民革命时期国民党的党员构成(1924-1927)》认为,国民革命时期国民党的党员结构打破了以往知识分子、军人、商人为主体的结构,大量的工人、农民进入了国民党。这反映了不同阶层对国民党政治认同的差异性和部分一致性。知识分子、军人、商人对国民党基本保持一定的认同感,而工人、农民随着革命的发展对国民党认知的水平提高。万振凡、万心《建国以来国家对病态地域社会治理——以江西余江血防为中心》指出,民国时期血吸虫病流行的余江疫区是一个典型的病态社会,1950年代在国家强力支配下,国家成功介入到了余江地域社会,并对之进行了成功的治愈,塑造了余江地域社会的“血防特色”。这是国家塑造地方特色的典型案例。陈晓律《欧洲社会福利制度的普适性与特殊性(摘要)》从欧洲的特殊性和现代保障体制的普适性入手,认为生产和消费的社会化必然导致福利保障的社会化,具有普适性的特点,但在欧洲内部、外部之间也存在着特殊性。一国福利制度的建构不仅需要现实的经济基础,还要考虑长远的经济潜力和经济能力。付成双《1872年采矿法: 环境破坏的政策根源》研究得出,美国《1872年采矿法》推动了矿业发展和边疆开发的同时,也成为了严重的环境破坏、污染的政策根源。随着环境破坏的日益严重和资源保护运动的兴起,美国社会着手解决矿业发展所带来的问题,走上了生态修复之路。俞金尧《论全球化进程中的时间标准化》针对当前学界对全球化空间维度的重视而忽视时间维度的问题,专门对时间观念和计时体制化进程进行了探讨。研究认为,由于时间的社会性导致全球交往层面上时间的趋向统一,全球时间标准化成为一个必然的趋势。在计时体制化进程中,国与国直接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而标准时间的最终确定,也基本上是一个国家霸权的反映。柴彬《百年来欧美国关于“一战”战责问题研究》研究得出: 20世纪20年代末,一战各国政客、学者针对“战责”问题展开了讨论; 20年代末到50年代,罪责皆有及无责任主体说相继应运而生; 60年代至70年代,费舍尔重提“一战”战责问题再引发大讨论; 80年代到90年代,战责问题研究出现多元化趋势; 新世纪以来,战责问题更加趋于多元,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淡化特点。

四、历史学的学科建设

历史学的理论方法问题、研究技术问题、文献资料等问题历来都是学术会议探讨的热门主题之一。许多新的理论方法、研究技术在学术会议上被众多学者了解、接受,可以直接促进历史学科的发展。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张萍《GIS与中国历史研究》探讨了近年来兴起的历史学研究的新技术——历史地理信息系统。作者认为,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建设是历史研究纵深发展的需要。GIS能使历史学研究理念得以更新,从而解决更多繁杂的问题; GIS应用能大大扩充历史研究的资料来源; GIS应用能够帮助我们完成一些动态追踪与综合性研究。钱茂伟《由组织本位而个人本位: 中国公众史学的学科建构》认为公共史学是历史学未来发展的趋势。其基本特征是“个人本位”,主要包括六大块,即公众历史书写、公众口述史学、公众影像史学、公众历史档案、公众文化遗产、通俗普及史学。公共史学建设有利于拉近历史学与公共的关系,可以促进历史学体系和历史教学体系的更新,也是走向“总体史”的必然发要阶段。

张侃《20世纪以来民间历史文献学的学理脉络与可能趋势》对20世纪以来民间历史文献学的学理脉络进行了科学梳理。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民间历史文献学未来发展的趋势,一是建立新的民间文献学体系;二是要重构地方史的“形而下之理”;三是全球史与域外交流加强;四是公共史学与历史记忆会成为史学研究新的领域。李凭《框定北朝系统而突显社会特征》突破以往学者对《北史》的评价,认为《北史》的历史价值在于其将晋到隋的历代王朝都视为整体,进而框定出北朝的历史体系,凸显出了战乱时代的中华传统文化经由宗族的传承而得以延续的社会文化特征,深化了对《北史》的历史价值的研究。陈恒《在城市发现怎样的历史?——评〈剑桥世界史〉》对剑桥史系列书籍的成熟背景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突出《剑桥世界史》形成的时代和史学背景,并对《剑桥世界史》的内容和特点进行了详细的评价。认为该书最大的史学特点就是在宏观的视角下,将非西方的早期城市纳入研究视野,凸显了世界史的研究视角和优势,打破了“西方中心观”。陈文海《“弗莱德加”与百年学讼》指出学界关于《弗莱德加编年史》的编者问题一直存在着三种观点。分别是以克鲁什为代表的三元论,以海尔曼为代表的二元论,以高法特为代表的一元论。持三种不同观点的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轮回式的研究、讨论、辩驳和反驳,持续时间近百年,形成三大学术流派,促进了相关领域的学术进步。

会议期间,学者们积极参与学术讨论,自由发表自己的学术观点。一些学术前沿的新问题和新理论、新技术得到探讨,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

(责任编辑:戴利朝)

(上接第179页)

- [20] Nicholas Tarling.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From World War II to the Present*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 [21] Nicholas Tarling. Britain. *Southeast Asia and the onset of the Cold War*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 [22] Nicholas Tarling. *A Modern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 [23] Nicholas Tarling. *Britain, Southeast Asia & the Impact of the Korean War* [M].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2005.
- [24] Nicholas Tarling. *Imperialism in Asia* [M]. Auckland: New Zealand Asia Institute, 2005.
- [25] 石沧金. 二战后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的政治参与[J]. 世界民族, 2004 (4).
- [26] 廖小健. 战后马来西亚华人社会演变[J].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1993 (2).
- [27] 廖小健. 英国战后马来亚政策的演变及其影响[J]. 世界历史, 2009 (3).
- [28] 张祖兴. 英国取缔马共的决策过程[J]. 东南亚研究, 2008 (5).
- [29] 张祖兴. 英国殖民当局与马华公会的成立[J].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2009 (1).
- [30] 陈国威. 1924-1945年国民党海外部与侨务工作考论[J].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2008 (3).
- [31] 陈肖英. 国民党执政50年“侨务”政策初探[J]. 台湾研究, 2009 (2).
- [32] Joan S. H. Wang. *In the Name of Legitimacy: Taiwan and Overseas Chinese during the Cold War Era* [M]. The China Review, 2011.
- [33] Stephen Fitzgerald. *China and the Overseas Chinese: A Study of Peking's Changing Policy, 1949-1970*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2.
- [34] Meredith Oyen. *Communism, Containment and the Chinese Overseas* [A]. Zheng Yangwen, Hong Liu, Michael Szonyi. *The Cold War in Asia: The Battle For Hearts and Minds* [C]. Boston: Brill USA, 2010.

(责任编辑:戴利朝)